

掩于岁月深处的
青葱记忆

王蒙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0
years

太阳鸟十年精选

王蒙 主编

掩于岁月深处的 青葱记忆



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

©王蒙 20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掩于岁月深处的青葱记忆 / 王蒙主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1

ISBN 978-7-205-09123-1

I. ①掩…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6291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1（邮 购） 024-23284324（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发行部） 024-23284304（办公室）

<http://www.lnpsh.com.cn>

印 刷：沈阳博雅润来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60mm×230mm

印 张：15.75

字 数：247千字

出版时间：2018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赵维宁 艾明秋

装帧设计：丁末末

责任校对：张 帆

书 号：ISBN 978-7-205-09123-1

定 价：48.00元



这套“太阳鸟十年精选”所收录的文章均选自过去十年我为辽宁人民出版社主编的太阳鸟文学年选。太阳鸟文学年选作为每年国内出版的多种文学年选中的一种，已经坚持了近二十年。它说明辽宁人民出版社的这套太阳鸟文学年选具有相当的历史性，表现了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们的坚持不懈，这也是年选权威性的一个方面。

太阳鸟文学年选近二十年来，纳入其编选范围的文体大致六种，即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和杂文，这一次编辑将选文的体裁限定在了“美文”，杂文记忆中也只选了三四篇。整套书共十三种，包括《途经生命里的风景》《异乡，这么慢那么美》《故乡，是一抹淡淡的轻愁》《这世上的“目送”之爱》《历史深处有忧伤》《愿陪你在暮色里闲坐，一直到老》《你所有的时光中最温暖的一段》《那个心存梦想的纯真年代》《一生相思为此物》《掩于岁月深处的青葱记忆》《在文学里，我们都是孤独的孩子》《艺术，孤独的绝唱》《那个时代的痛与爱》，除《那个时代的痛与爱》主题相对分散，其他内容包括国内国外、故乡亲人、历史人物、童年校园、怀人状物、读书谈艺，可以说涵

盖了人生的方方面面，可供阅读群体广泛。集中国十年美文创作于一书，这个书系的作者也涵盖了中国当代文学写作，尤其是散文写作的大量作家，杨绛、史铁生、袁鹰、余光中、梁衡、王巨才、王充闾、周涛、陈四益、肖复兴、李辉、王剑冰、祝勇、张晓枫、刘亮程、毛尖、李舫、宗璞、蒋子龙、陈建功、李国文、刘心武、李存葆、陈世旭、梁晓声、陈忠实、贾平凹、铁凝、张承志、张炜、余华、韩少功、王安忆、苏童、周大新、格非、迟子建、刘醒龙、刘庆邦、池莉、范小青、叶兆言、阿来、刘震云、赵玫、麦家、徐坤等。还有黄永玉、范曾、韩美林、谢冕、雷达、阎纲、孙绍振、温儒敏、南帆、陈平原、孙郁、李敬泽、闫晶明、彭程、刘琼等艺术家和评论家。他们的阵容，令人想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为了“优中选优”，我重新翻阅了近十年的太阳鸟文学年选散文卷和随笔卷，并生出一些感慨。文学应该予人以美，包括语言之美、结构之美、韵律之美，更包括思想之美、情感之美、叙事之美，言之有思，言之有情，言之有恍若天成的启示与灵性。美好的东西总是让人念念不忘，文章也是如此。重读这些当年选过的文章，依然让人或心潮澎湃，或黯然神伤，或感同身受，或心向往之，一句话，也就是我最入迷的文学品性：令人感动。

大概十年前，为了继承和发扬赵家璧先生在良友图书公司主持“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传统，我曾为出版社主编过“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我在序言中曾说，文学是我们的最生动、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我们的“心灵史”。我希望这套选本，也能不辜负读者与历史的期待。



2017年9月



从维熙	经典人生 ——萧军百年祭 …… 001
陈四益	艰难的生存 …… 006
袁 鹰	追忆艾青二三事 …… 013
牛 汉	我的文坛诗友(节选) …… 023
黄育海	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 …… 033
李 辉	黄宗英：此情悠悠谁知？ …… 042
阎 纲	能不忆金镜？ …… 051
任芙康	别一种送行 …… 063
迟子建	一个人和三个时代 …… 071
叶兆言	万事翻覆如浮云 …… 083
刘心武	被春雪融尽了的足迹 …… 101
李 辉	甲子年冬日 …… 109
黄永玉	难忘的清流绝响 …… 145
陈建功	吾师浩然 …… 151

张艳茜	病危中的路遥	157
韩少功	一个伪成年人	169
丹 晨	他留下的绝笔.....	179
王安忆	蝉 蜕	184
范 曾	准将的肩章 ——记戴高乐将军	194
铁 凝	天籁之声 隐于大山	204
黄济人	未了情	213
阎晶明	一个人和一种命运的逝去 ——怀念我的导师黎风先生	218
铁 凝	“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227
潘向黎	再见，白鹿原!	239

经典人生

——萧军百年祭

从维熙

在中华文化长河中，有经典著作；在芸芸众生的人世间，也有经典人生。作家萧军则可谓其中的一个。一百年前的农历五月二十三日，萧军落生于辽宁省的一个小小村落。按照阳历折算，今年（2007年）的7月7日，是萧军的百年诞辰。

笔者之所以把萧军的人生之路称之为经典人生，实因在中国的文学星空，萧军的生命曲线，是许多作家无法比拟的。在他八十一年生命里程中（1988年6月22日辞世），太多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太少作为文人的清淡闲雅。据萧军自述中记载，他刚刚出生不久，母亲就逝去了，这似乎是为他艰难的人生拉开了序幕。之后，在军阀割据的年代，他从军习武，在讲武堂因打抱不平，而先蹲禁闭号，被开除出军队。至此，他从军救国之梦想完全破碎，生活迫使他改弦易辙，在哈尔滨开始了从文的步履。

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萧老同在北京作协，因为我与萧老命运曾

有近似之处，自然而然交往较多。记得，老人曾经对我说过如是的一段话语，他说：“我生性就是跃马横刀的军人坯子，可是九曲回肠的人生，让我扔下手中的枪，拿起笔涂鸦我认知的生活，竟然成了一个写作的文人，实在有违我的初衷。”这是萧军最为真挚的心愿表达，那洪亮中略带沙哑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说来也巧，在一段时间里，我和萧老不仅同在北京作协，还同住在团结湖小区，有一次与萧军树荫下不期而遇，我们坐在一条临街的长椅上说话的时候，我无意间拿了拿他随身带着的拐杖，竟然把我吓了一跳。这根拐杖的扶手，镶嵌着一块圆而亮的铸铁，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拄着它出来散步，简直是个沉重负荷。因而我对萧老说，它重得就像是我在劳改矿山使用的挖煤铁锤。萧军回答我的话，再一次显示出老人在黄昏斜阳年纪，仍没有消失的他个性中的阳刚。他对我说：“我拄着它出来，除了健身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在街上碰到社会的蛀虫或流氓一类的东西，欺压善良时，可以拔刀相助，教训他们做守法公民。”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萧老，您都一大把年纪了……”

“怎么办呢，人的性格难以重塑。”萧老为我解疑地说道，“为真理呐喊了大半辈子了，积习难改。”

这就是萧军的精神肖像。尽管生活没有成全他从武的梦想，但在他从文的轨迹中，依然可以看到这种血性的伸延。前两年，我走访过东北哈尔滨呼兰区的萧红纪念馆，在那里我看到拯救才女萧红于冰雪炭途的第一个人是萧军；我联想到1933年鲁迅逝世时，担任万人为鲁迅送葬的总指挥的人是萧军；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敢于向毛泽东提出文艺真实性问题的又是萧军；日本投降后，在东北承办《文化报》期间，因为勇于面对社会真实而遭伤害的还是萧军。其中让我最最难忘的，是“文革”期间的萧军。当时，文化人对红卫兵的批斗，无不哑然失声；

而萧军则与之相反，可谓是那个年代的绝无仅有。谈起这段往事的地点，是萧老在我家吃红烧肉的餐桌上。老人说：“你曾说过，你在京郊团河农场劳改。我也去过那儿，‘文革’中期团河农场一度成了批斗北京文化人的场地。我在那儿也受过批斗，不同于一些文化人的是，我可不那么顺从；在批斗我之前，我对红卫兵头头说：‘我活到这把年纪，已经是超期服役了；如果对我进行武斗，我年轻时在讲武堂当过武师，下面的话就用不着我说了，希望你们珍惜自己的青春。’红卫兵何尝听不出来我萧军的弦外之音，便在会前与我达成某种默契：不触动我的肌体，但我必须低头听从他们的批判。于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我总是半闭着眼睛，听他们高喊声讨‘反动文人萧军’的口号，耳朵虽然受到些刺激，但他们的皮带和鞭子，没有伤及过我的皮肉。”

在餐桌上，不仅我听愣了，连给萧军做红烧肉吃的我的老母亲，听了萧军这番自叙，脸色都变灰了。直到萧军饭罢离开我家之后，我母亲才悄声地问我：“他咋敢与红卫兵对阵，这事是真的吗？”我说：“在生与死的问题上，不能把萧军与其他文人等同看待。”我没有对母亲说得太多，因为她对这位当时的文坛长老缺乏深刻的了解。但是我早已认知，如果中国确有特殊荷尔蒙制造出来的、骨骼中又富有丰厚钙质的文人——这个人就是作家中的萧军。可以说，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是一个阳刚的血性汉子，直到他的生命终结。

还有不能略去的一笔，是他对文化中的犬儒主义的憎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两次与老人同行出访过大地震后的唐山和香港、澳门；后来我去东北时，又与老人在东北鞍山相遇。在这次交谈中，我第一次听到犬儒主义这个词汇。他说：“人的才能有大有小，因而历史上有大儒和小儒之分；但大儒和小儒中间，最卑劣的就是犬儒。经过时间检验，一些儒者的犬儒，几乎都当了历史中的奸臣和奸相。如宋代卖国的秦桧和抗日战争中间当了头号汉奸的汪精卫……”特别让我记忆深邃

如同刀刻的，是萧军对大诗人李白的评说。他说李白留下的诗章，可谓传颂千古，是个旷世绝才，当属中国的大儒；但他留下的人生败笔，不能略去不提。那就是他被贺知章引进宫廷时的得意和后来离开宫廷时的失意，乱了做人的方寸。到了唐朝内乱时期，他投靠叛军的人生轨迹，也就不奇怪了。他的结论是：爱什么，恨什么，是不能因为个人利害而移位的；而文化人中的犬儒主义者，爱和恨是随着处境和地位而变化的。

萧军这段人文自白，可谓是他的生命经典。回眸他曲线的人生，无论在得意和失意时，他都没有失去他做人的方圆。他热爱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更热爱黄土地上生存的人们，他仇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祸国殃民。因而他从年轻时起，就把自己献给了中国革命。后来，他之所以路途坎坷艰辛，因为他不能容忍假面人生。他早期“写下的小说著作《八月的乡村》和后期遭遇出版难产的《五月的矿山》以及《过去的年代》，都是他人文行为的佐证。难怪鲁迅先生在为《八月的乡村》写下的序言中，留下了如是的话：“……我见过几种说述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与法捷耶夫的《毁灭》相比，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蝥蛄，蚊子，搅成一团，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部分和全部，现在与将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鲁迅先生这些凝聚着墨香的文字，今天读起来虽然有些绕口，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萧军人文精神以及爱国情怀的颂扬。

这样的作家，我们后来人不能忘怀。记得，在萧军第一次病危的时候，我和张洁曾从一个会议上逃会，风风火火地跑到同仁医院去探视老人。更让我不能忘怀的是，1988年6月22日，久旱无雨的北京，突然下

了一场淋漓爽透的大雨。就在那个落雨的午夜，我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打来电话的是北京作协党组书记宋汛，他沉痛地告诉我，萧军于今天西归了。面对夜空中飞舞的雨线，我流下了思念的泪水。我想，天地间的滂沱大雨，也是在为这位文坛硬汉而悲泣吧！为祭悼老人的离世，我在《收获》上发表了《人生绝唱》的长篇祭文，副题为“萧军留下的绞水歌”。根据萧军的个性，此时他在天堂，也是不会贪图安逸，此时他或许仍在井口提水，我祝愿老人提上来的再也不是一桶桶的苦水，而是一桶桶的甜汁……

原载《文汇报》2007年7月16日

艰难的生存

陈四益

不知怎的，一想到潘旭澜先生，就想到一副苦难的面容。在复旦读书时就是这个印象。叶绍钧先生有一篇小说，内容已经毫无印象，只有一个篇名牢牢记住，叫“潘先生在难中”，每当脑海中浮现潘旭澜先生受难的模样，便记起这个篇名，与小说的内容毫不相干。

我于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潘先生是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的。中文系济济多士，正教授就有十六人之多。我们这些新生，好奇的眼睛盯着教授们已经应接不暇，刚毕业的助教则对不起，还没来得及进入视野，虽然三十年后他们都声名卓著成了中文系的台柱。

大学一年级，除去政治、外语等公共课，专业课程就是四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和语言学概论。两门概论，是蒋孔阳、濮之珍夫妇两位讲师包圆儿，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则分别由张世禄、胡裕树二位先生授课。潘旭澜先生属现代文学教研室，整整一学年，没同他有什么接触。直到第二学年，他给我们讲授现代文学史，才把潘旭澜这个名字同那黑瘦、高挑、微驼的形象联系起来。那时，刚毕业的助教一般

都只上辅导课，以助教登台授课，就是相当器重了。当然，由于贾植芳先生在我们进校前已因胡风案捉进牢里，鲍正鹄先生到苏联讲学，方令孺教授调任浙江文联主席，余上沅先生改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只有刘国梁一位讲师，助教不上台也真的拉不开栓了。

潘先生给我们讲了些什么，到今天已通记不得了，只记得他那沉稳而抑扬有致的一口福建官话和讲课时两手撑在讲桌上不时溜一眼讲稿的姿态。潘先生讲夏衍，听起来像“夏也”，而夏衍的剧作《法西斯细菌》，听起来却是“花西西细菌（读阴平声）”。与他同时为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的伍柏林先生，不记得是何方人氏了，他把“赤裸裸剥削”读作“切科科剥削”，于是同学中便以“切科科”对“花西西”，以为笑乐。但这只是因为好玩儿，并没有什么不敬的意思。

我们这一拨儿学生是不大容易对付的。刚刚经过了“反右”，老师们虽未必战战惶惶，却也相当拘谨。学生们则因到了1958年，开展“教育革命”，一会儿下乡办学，一会儿开门办学，一会儿把老师赶下台自己上台讲课，一会儿把老师当靶子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一会儿又自己编教材写书，反显得蹈厉嚣张。教学秩序既已打乱，师生伦理也不复旧时。说几件小事可见一斑。

蒋天枢先生，现在许多人因为读陈寅恪，知道他是陈门弟子，陈寅恪的文稿、诗稿是交由他保存、整理、辑集的。他的学风也承继了师门严谨细密笃学深思的风格。学生的浮躁实在令他看不下去，于是发为言论：“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先独立而后思考。你们尚未独立，如何思考？”这话作为长者的规劝，本无过错，但为了这一句话，蒋先生成了“群众运动”的“观潮派”，说他“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群众运动”据说是天然合理的，说三道四就是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蒋先生因此受到批判。

蒋孔阳先生所著《文学的基本知识》，是作为“文学概论”课的讲

义使用的。同类的书，詹安泰的、霍松林的、刘衍文的，一时出了不少，但大体都不出苏联专家毕达哥夫讲授的框子。毕达哥夫是国家聘来的苏联专家，在北大办讲习班，各大学都派人去学习。当然，毕达哥夫又是大体沿承苏联季莫菲也夫的《文学原理》。但无论如何，这些内容原本是上面“钦走”的文艺理论样板。不料到了这时，苏联文艺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又因违背了中国官方的最新思想，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蒋孔阳先生也就在劫难逃，成了所谓“典型”，连课堂上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譬如说雨中游虹口公园别有一种情趣，读古诗词、同古人交朋友不会吵架之类，也成了批判的靶子。

最让人回想失笑的是，章培恒先生上课时，开言刚说“诸位”二字，即有同学站起来表示反对：“不要诸位诸位咧，叫‘同学’或者‘同志’嘛！”弄得章先生一时不知所措，只好喃喃地说：“那么，好吧，同学们……”

这些事情比之“文革”之际的“打倒”“砸烂”，虽要温和许多，但在一阵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刚刚过去、教师人人心中有余悸之时，上课并不是一桩轻松的事情。略有疏忽便可能惹出麻烦。但是，对潘先生的授课，记忆中好像并没有人提出过什么尖锐的批评。这是他谨慎小心，也说明思虑得周详细密。

不过，任你如履薄冰，有的人仍旧生来就被打上了不可信任的印记。潘先生能在1956年留校任教，可能是他的幸运，因为那时正是高喊“向科学进军”的年代。业务能力的强弱，在是否能够留校任教的权衡中举足轻重，而且教授的评价也至关重要。若是晚一两年，到了“反右”之后，情形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政治标准”一举压倒了业务标准。而所谓“政治标准”，家庭出身之外，便是是否听党的话，是否与党同心同德。这个“党”，经过了“反右”的诠释，已经具体化为党委、总支、支部的各级负责干部——因为在“反右”前的“鸣放”中，

凡是对党员领导干部（哪怕只是支部书记）提出过尖锐批评的，几乎都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用这个政治标准衡量，“业务尖子”就大可怀疑了。加上潘先生的家庭出身似乎有点什么问题，又因为执拗的个性，对一些靠“政治正确”吃饭的人也不能曲意逢迎，因此一直被认为是“白专道路”的典型。从1956年到1966年，唯一的一次职称晋级，按规定，1956年以前毕业的助教都可晋升为讲师，唯独潘先生因为“白专”，未予晋升。今天，不少年轻学人对潘先生当了二十多年助教大惑不解，其实，比潘先生晚一两年毕业的，几乎都当了二十来年助教，因为错过了那一次晋级，没过多久就是十年暗无天日的“文革”，挨批挨斗尚无从躲避，哪里还敢奢望晋级！

钻研业务是“白专”，可是，像潘先生这样背着所谓家庭包袱的人，如果不靠业务，恐怕就更难立足。幸亏业务了得，才能因“有用”而始终留在讲坛上。

在那个年代，钻研业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问之道，已经有了新的标准。这标准就是要按照一层一层传达下来的“精神”，不停地更换言语，或愤怒，或欢乐，或谦卑，或感动，以配合当前的政治需要。然而政治是多变的。配合政治需要，弄不好也会碰得鼻青脸肿。譬如，吴晗写海瑞，原本因为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是为了响应号召，不料后来风头一变，提倡海瑞精神就变成为彭德怀翻案了。又譬如，毛泽东提倡“不怕鬼”，为了激励“反帝反修”的斗志，何其芳还奉命搜罗了不少说鬼的故事编成《不怕鬼的故事》刊印出版，毛泽东也赞赏过《聊斋志异》中的狐鬼，似乎谈狐说鬼并非不可，但时过境迁，到了“文革”前夕，适应新的需要，写鬼的新编昆曲《李慧娘》就成了“大毒草”，阐述鬼戏教育作用的文章，也成了反动的“有鬼无害论”了。再如，说《水浒传》“好就好在写了投降”可以，因为是“最高指示”，但若以为“同理可证”，谈论孙悟空是“投降派”，压在五行山下，受了

招安，帮着唐僧去打过去自己的兄弟了，只怕又要“罪该万死”，因为毛诗有“今日欢呼孙大圣”之句。由此可见，配合不易，何况要配合，先得摸清“气候”，消息灵通，才能得风气之先。以潘先生的地位与处境，是绝无此种条件的。

潘先生既不肯也不能逢迎时尚，于是选择了一条在当时似乎还可以独善其身的道路，避开那些敏感的政治风云，把心力集中到研究文学的艺术特色或艺术辩证法上。这在大跃进高烧稍退之后，曾是不少头脑冷静者的共同选择。记得那时学生中曾有“走姚文元道路还是李希凡道路”的讨论。从指导者的意图来看，希望肯定紧跟政治需要“投入战斗”的所谓“姚文元道路”。“李希凡道路”则被当作书斋研究的例证。可是讨论的结果，似乎二者都不被认同。姚式的棍子固然让人生厌，李式的研究套路也令人觉得空泛而无创见，无益于文艺的探索。吸引人的倒是如苏联拉宾《论情节的典型化与提炼》或王朝闻先生《新艺术创作论》《一以当十》等著作中那些有见地、有材料、又不枯燥乏味的艺术分析。那时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专著、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也使人们的视野不为一两篇《讲话》所拘。潘先生好像就是这样开始写作他一连串“艺术断想”的。几十年后，潘先生曾经讲到王朝闻的著作对他的影响。当然，他也讲到这些“断想”，不久也因“阶级斗争”的雷声“轰轰烈烈”，再也“想”不下去了。

生活在今天的年轻朋友，难于理解潘先生这一代的生存环境。这实在是一种艰难的生存。要你说的不想说，你想说的不能说，转弯抹角想寻觅一片安静的港湾，但遍觅国中，却无可以避秦的桃源。没有了自由的思想环境，也就没有了自由的学术。潘先生虽然竭力想保持一些独特的思考，但终于是戴着镣铐跳舞，怎么也迈不出轻快优美的舞步。待到梦魇般的十年过去，他已经人过中年。

我的师辈，粗略地分，有两代人。一代如郭绍虞、刘大杰、朱东